

# 澳洲婦女志願服務：兩性關係與照護工作

周海娟

## 導論

根據新南威爾斯大學社會福利研究中心（the Social Welfare Research Centre of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，該中心現已改為「社會政策研究中心（Social Policy Research Centre）」）在一九八〇年代初的一項全國性非政

府福利部門調查顯示，全澳15歲以上人口約有7%至13%參與福利方面的志願服務工作。（Hardwick and Graycar, 1982: 11）這尚屬保守的估計（因為，醫院、政府部門和地方議會等大量的義工人數均不包括在內），其他各項區域性研究（Paterson, 1982; 1979; A. B. S. 1986; 1983; 1982）則顯示，15歲以上人口約有30%參與志願服務。

志願服務的重要性，不僅是表現在參與者的多寡，許多非政府福利部門

均是完全由義工推動，正如Yates和Graycar（1983:159）指出，有三分之一的非政府福利機構是以義工為主。

然而，這些義工是誰？澳洲大多數的研究（例如：Hardwick and Graycar, 1983; Fisher, 1983; Wheeler, 1986; Vellekoop - Baldock, 1990）都發現，有相當高比例的婦女參與日復一日的志願服務工作，並指出參與者主要是未從事有薪勞動者。雖然Curtis和Noble（1988:22）持不同看法：認為所有的義工均是婦女，只是一種迷思；但仍不可否認婦女在志願服務的重大貢獻。因此，本文主要目的在探討婦女與志願服務的關連，從兩性關係的角度檢討國家福利和志願服務中的婦女角色。首先，審視婦女與照顧工作；其次，探究志願服務與兩性關係；最後，討論志願服務與國家福利。

## 婦女與照顧工作

在Vellekoop - Baldock所做的有關西澳福利組織研究（1990）顯示，不論是義工或有薪職員的每日例行服務援助，婦女均扮演著重要角色。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儘管大量婦女投入義工的行列，但卻很少婦女在管理委員會中佔有一席之地。這或許和婦女傳統角色，公共與私人領域二分，勞動市場的隔離有關，以致呈現出照顧工作上，兩性不平衡的現象。

### 1. 家庭、社區與國家

福利的提供，從過去大量由私人領域（家庭）負責，演變至今日逐漸由國家提供。（Wells, 1987:58）這似乎是對歷史傳統價值：它是「婦女的工作」的挑戰。

傳統婦女角色被定位在家庭，意味著「不事生產」：婦女的工作與酬勞無關。因而「家庭內的照顧老人、兒童及其他勞動就成為低價值、甚至理所當然」是「婦女的工作」。然而，隨著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，婦女進入就業市場，尤

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，國家開始干預家庭福利服務的提供，「福利國家」就意味著國家福利逐漸取代家庭福利的事實。以往由家庭擔負的照顧與維生等責任，已由國家藉著各種津貼和制度化照護措施的提供，介入傳統的家庭運作。婦女在家庭照顧工作上具有「無給職」的特性，因此，往往不受重視或不易察覺，相形之下，國家提供的福利與服務就較為顯而易見。

婦女從家庭走入市場或由市場退回家庭，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經濟景氣與否，而國家對家庭的干預程度，經濟因素也有著決定性的影響。國家財政出現危機、政治上和意識型態的轉變，均是促使國家將部分服務與福利交回給家庭的動力。然而，由於國家長期介入傳統的家庭運作，已使得家庭產生本質上的變化，不易再度擔負這些原有的服務與福利，因此，社區就成為家庭與國家之間的中介團體，社區照護也成為國家少支出及補充家庭福利不足的一種新趨勢。在這種變遷過程中，婦女從家庭照護者的角色拓展到社區照護者的功能，誠如Mowbray與Bryson（1984:261）所指出，婦女日常從事的福利工作至少有兩種：一是家庭內無給的工作，一是志願或有給的社區福利工作。許多地方性福利服務也都高度仰賴志願與低報酬的福利工作者，其中尤以婦女佔大多數，Vellekoop - Baldock的研究（1990）即顯示幾項可能原因：(1)有空間的已婚婦女參與志願服務；(2)案主的特殊需求，例如：該組織是專為婦女設立的，當然需要由婦女從事服務；(3)同性較易溝通；(4)該論題必須和婦女共同討論。該研究另一項有趣的發現則是：有76%的受訪者認為男性和女性同樣適合從事志願服務工作，但也有24%的受訪者認為婦女較男性適任志願服務。（Vellekoop - Baldock, 1990:29）或許，這就是照顧工作從家庭到國家、再到社區的變遷過程中，婦女一直擔負重要角色的原因。

### 2. 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二元對立

婦女參與就業市場之邊際性格的諸多解釋，均強調家庭與工作的隔離，這種隔離則是工業資本主義的產物，傳統上，政治和經濟的分析均視家庭為遠離

公共生活的私人領域，家庭被賦予休閒場所的色彩，它是有薪工作者下班後得以休息的「天堂」，他可以盡情享受未就業配偶的悉心照護。

然而，女性主義在理論上的重要貢獻之一，就是破這種素樸的私人領域概念的神話，她們認為，家庭並非是不受公共領域壓力影響的場域。(Sassen, 1987; Dwyer, 1989) 因此，婦女的家事與非正式照護就成為女性主義者分析的主要論題之一。

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二分實與兩性分工有密切的關係。在當代都市家庭（或說「家戶」）的日常生活中，存在某種定型化的分工方式：某些工作是家庭內的、無給的，且通常是由婦女擔任；其他的工作則是公共的、有酬的，且以男性從事居多。因而，婦女的工作性質與領域就在這種分工方式下，被畫上界線。這種性別分工反映出「婦女地位」的概念；但這是誰下的定義？誠如 Colin 和 Howard 的觀察，家庭分工的方式，有部分是夫權界定婦位的結果。(Connell, 1987: 122)

許多女性主義者一再強調，事實上婦女從事的家庭無給職已對經濟做出重大貢獻，婦女不僅照顧丈夫與孩子的生活起居、情緒問題，並且給孩子市場經濟工作倫理及行為模式的社會化教育，因而能維持現有及未來的勞動力。(Eisenstein, 1979; Curthoys, 1979)

婦女在非正式照護的無給勞力（尤其是照顧年老親屬、病童或殘障兒童），可能與婦女經濟的依賴地位及女性化的照護特質有關，即使她們是職業婦女，也同樣經歷到必須擔負照護責任的沉重壓力。Ungerson (1985: 151) 即指出，婦女在非正式照護中佔有重要地位的原因：(1) 婦女自認為是家庭的主要工作者（即使是職業婦女），一旦家中有人需要照護，她將是最佳人選；(2) 照護的實際工作與母親的角色類似，而且兩性的分工也設定了一套有關禁忌和不潔的規則，以防止男性參與身體照護的工作；(3) 婦女有酬工作的相對低薪資與邊緣性，就意味着做全職照護者或兼任照護者的機會成本，似乎是女性大於男性

。

雖然婦女擔負的非正式照護多半在家庭中，因而不被認為是社會福利服務的一部分，相反地，它被看成家事的一部分。針對這種看法，女性主義者認為，實際上，這類非正式照護應該從更寬廣的視野來看，它可以是正式組織服務的替代品。(Parker, 1985; Vellekoop-Baldock, 1990) 特別是目前朝向非制度化照顧體弱老人與殘障者的趨勢，就是將公共領域的服務援助移向私人領域，例如，近年來澳洲政府大力鼓吹的「住家與社區照護計畫」(the Home and Community Care Program，簡稱HACC) 即是一例。事實上，「社區照護」一詞，通常意指著由婦女在家中給予照護，換言之，婦女的非正式照護既是國家福利服務援助的擴充，也是其替代品。

### 3. 勞動市場的隔離

「勞動市場隔離」是指勞動力區分為兩個次級團體的概念：各個次級團體有互異的工作條件與升遷機會：(1) 主要部門 (primary sector)：優厚的酬勞、良好的工作條件、較佳的升遷機會等是其特色；(2) 次要部門：相對於前者而言，不安全且較差的工作環境、低報酬、升遷遲滯等則是此部門的特徵。這種隔離尤其表現在性別、種族或民族的類別差異上。(Collins, 1978; Power, 1976)

此一勞動市場隔離的概念是否適用於無給的志願服務？或者志願服務就是次要部門的延伸？或者志願服務本身就區隔為主要和次要兩部門？或許可從志願服務者的分工情形得到一些啟示：從事低給或無給志願服務的婦女，通常被認定是無技術的照護者，且由男性主管監督其工作。雖然仍有部分婦女得以擔任福利當局的較高職位（義工委員或有酬專業人員），但大多數的婦女仍以提供照護服務為主。Vellekoop-Baldock 的研究 (1990) 即顯示，義工的邊緣性格正如婦女在勞動市場的弱勢地位：所從事的工作有如戰略上的犧牲品，經濟蕭條時，任用有新工作者的成本過高，是需要義工最殷切的時候，這就意味著

，在經濟危機時，那些從事與有新婦女類似服務項目的義工，可能會被要求取代她們的位置，所以，只要義工被視為業餘者，他們就不致威脅到有薪工作者。然而，目前的趨勢卻是對福利團體服務的需求日殷，對專業化和訓練的要求也日增，正如HACC計畫要求義工訓練、義工保險及較多的會計責任。這可能導致對義工的要求更高，進而確保較高品質的義工。

## 志願服務與兩性關係

許多研究均指出 (wheeler, 1986; Hardwick and Graycar, 1982; Marchant and Wearing, 1986)，有相當高比率的婦女參與日常服務工作 (有薪或志願服務)，但在高層行政人員和名譽委員會會員方面，卻是男性佔優勢。這種以性別為區分的層級關係，我們不能只從婦女本身的參與機會來解釋該現象，而必須從兩性關係的結構來討論。

性別意識型態最普遍的過程涉及結構的崩解，透過「自然化的」(naturalizing) 社會現實將各元素合併為一。(Connell, 1987: 246) 這種將兩性關係當做自然事實的解釋是最廣泛的看法，兩性分工也是循著此一線索加以詮釋，例如，對婦女照護兒童的解釋，幾乎理所當然地認為，婦女有一種「天生自然」的慾望要照護兒童。「異性相吸」是自然的，「同性戀」則是不自然的，當然也就不被社會允許。一旦被認為是「自然」的事，就會有一套附帶的規範和價值與之相連，進而以「理所當然」的社會現實姿態出現。當對立的社會關係在不同時地被自然化時，就凸顯出該過程深遠的政治性格，將社會關係詮釋為「自然」，根本就是扭曲史實，這無疑是扼殺人類創造人性的可能性。與其說「自然」是用來當做一種解釋，毋寧說是合法化的一種手段。而且為了能合法化，「自然」本身必須具有三過程：簡單化、概要化和道德化。因此，自然化隱含了性別意識型態的第二個基本過程：兩性世界認知的單純化，我們最熟悉

的形式之一，就是有關刻板印象的媒體研究。(Connell, 1987: 246) 例如，電視廣告中的家庭，全是幸福洋溢，父親就業，母親熱愛做家事，Spence 對攝影的婦女意象研究，即顯示刻板印象如何超越個人存在的過程：一組廣告或攝影建構出婦女生活的「絕對故事」(implicit narrative)，由此，個人存在就被體現在該廣告或攝影所訴求的邏輯。

性別意識型態最單純化的形式就是公共與私人二分的方式，然而，簡單化也正是複雜化的來源，為了將這種二分法推向極致，對兩性世界的區分就需要不同的文化機制予以操弄。這種單純化達到情緒的最高點時，就是把男性的同性戀視為失序、污穢與危險，然而，吊詭的是，這種父權制社會秩序對男性成員的此類性愛關係採取敵視。二分化的性別意識型態世界中，呈現二種主要的社會生活：(1) 浪漫主義：在日常生活中，灌輸女性「愛的宣言」和「幻想曲」，強化「女性特質」；(2) 霸權的男子氣概：透過「英雄」的形成予以自然化，這不止是對大多數「非英雄」男性優勢地位的正當化，誠如前者，它是象徵式地處理真實問題的一種手段。

既有的社會秩序已經由性別分工的形成，將兩性的職業取向、工作能力與範圍等自然化於日常生活秩序中，所以，志願服務呈現的圖像往往是二分化的：男性擔任監督者和計畫者，女性從事實際照護工作；男性常因差級而不願從事照護工作，因為這是父權制社會秩序的倒錯，是背離「英雄氣概」的行為。

## 志願服務與國家福利

義工的招募可說是志願服務重要的一環，一般而言，約有下列幾種方式：(1) 口頭上的招募：這是最重要的一種方式，有些團體是透過教會的網絡招募義工；(2) 以該組織的名聲著稱者：通常應用於許多較大型的知名志願團體；(3) 親友、會員參與：常見於自助或社會行動團體；(4) 討論會：有些自助團體會舉行

一些討論會，藉此激起參與者從事志願服務的興趣，有時也會刊登報紙廣告招募義工。

無論透過何種方法招募義工，除了義工本身外在條件（例如，技術的要求），利他主義性格可說是一項重要的個人內在特徵。女性主義者指出，不管利他主義被賦予多高的評價，只有婦女是被期望扮演這個角色的人，特別是在私人領域（家庭）中扮演利他主義的服務提供者；至於男性佔有的公共領域，其特徵是利己主義與競爭、照護和助人的化身，而這些都是慈善活動與志願服務不可或缺的要件。（Torney, 1976）基於此觀點，女性主義者進一步指出，婦女所表現的利他主義，其實是被迫而非出於自由選擇的結果。Torney（1976:219）就認為，婦女被灌輸「將他人利益置於自己之上，本身就是一件有價值的事」的觀念；言下之意，利他主義就是自我否定和自我犧牲，利他主義意識型態的存在已成為迫使婦女提供服務，且不求回報的教條。福利國家就建立在這個意識型態的基礎上，誠如貝佛里吉（J. Beveridge）所說，大多數婦女有工作而不求報酬的習慣，對家庭的服務，也從未考慮回報的多寡。

福利國家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開始出現危機之後，就企圖將福利服務逐漸分散給家庭，婦女利他主義的「習慣」使她們成為最佳接棒人；Dalley（1988）就指出，婦女已經內化了這種利他主義的理念，社會也因而利用它；婦女隨時準備留在或退回家庭擔任照護者，社會擁有一支等待出發的「照護後備軍」，這支後備軍既不需要另建醫院，也不需給付薪資，並且逐漸地主動提供社區照護，計畫者政治家更無需憂慮成本問題。

國家福利逐漸移向家庭福利，或由志願團體承擔部分責任。婦女的角色與地位相當重要，尤其照護的功能更是減輕國家財政負擔的重要資源。

## 結 論

福利的提供，特別是照護服務，由私人領域移向國家主導，然而，因福利國家危機的出現，國家企圖將照護服務再交還給家庭；這個變遷的過程似乎是透過國家干預強化父權式福利的歷程。

婦女不時扮演「待命的」後備軍的角色，在勞動市場是隨經濟景氣與否而進退的產業後備軍，在福利提供方面，則是視國家福利的介入深淺，隨時調整角色：可以是家庭、社區或志願團體的照護者，公共與私人領域的區分可能只是父權式支配的一種手段，目的是便於調動這支待命的後備軍。

勞動市場的隔離或許是公共和私人領域二分的產物，二分法將婦女的工作畫定了界線。為福利提供釐清了範圍：主要部門和次要部門、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、有薪工作和無給勞動、國家福利與志願服務、高度評價和貶低價值、男性策畫與女性服務等，均顯示一種不平衡的二元對應，雖然婦女志願照護工作者的貢獻不小，但在這個不平衡的體制支配下，只有重新調整兩性關係，去除父權制福利服務的迷霧，女性義工才能真正獲得志願服務的價值，志願服務的參與者才可能趨向兩性平衡。

## 參考書目

- <sup>1</sup>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(1982), Provision of Welfare Services by Volunteers —— Queensland, Year Ended November 1982, Catalogue No. 4401.3, Canberra: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.
- <sup>2</sup>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(1983), Provision of Welfare Services by Volunteers —— Victoria, Year Ended November 1982, Catalogue No. 4401.2,

- Canberra: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.
- <sup>cc</sup>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(1986), *Voluntary Community Work During Year Ending October 1986*, New South Wales Catalogue No. 4403.1, Canberra: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.
- <sup>cd</sup> Connell, R. W. (1987), *Gender and Power*, Cambridge: Polity. Collins, J. H. (1978), 'Fragment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', in E. L. Wheelwright and K. D. Buckley (eds.), *Essay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ustralian Capitalism Vol. 3*, Sydney: ANZ Books.
- <sup>ce</sup> Curthoys, A. (1979), 'Explaining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ur under Capitalism', *Refractory Girl*, December: 61-2.
- <sup>cf</sup> Dalley, G. (1988), *Ideologies of Caring: Rethinking community and Collectivism*, London: Macmillan.
- <sup>cg</sup> Dwyer, P. (1989), *Public & Private Lives*, Melbourne: Longman Cheshire.
- <sup>ch</sup> Eisenstein, Z. R. (ed.) (1979), *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*, New York and London: Monthly Review Press.
- <sup>ci</sup> Fisher, E. (1983), *Women's Voluntary Work*, Canberra: National Women's Advisory Council.
- <sup>ck</sup> Hardwick, J. and A. Graycar (1982), *Volunteers in Non-government Welfare Organisations in Australia: A Working Paper Social Welfare Research Centre Reports and Proceedings, No. 25* (September), Sydney: Social Welfare Research Centre,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.
- <sup>cl</sup> Marchant, H. and B. Wearing (1986), *Gender Reclaimed: Women in Social Work*, Sydney: Hale and Iremonger.
- <sup>cm</sup> Mowbray, M. and L. Bryson (1984), 'Women Really Care', *Australia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*, 19(4): 261-272.
- <sup>cn</sup> Paterson, H. M. (1979), *Voluntary Workers: Special Report No. 3, Bendigo: Bendigo Labour Force and Community Survey*.
- <sup>co</sup> Paterson, H. M. (1982), 'Voluntary Work in Australia', *Australian Bulletin of Labour* 8, 2 March, pp. 95-103.
- <sup>cp</sup> Parker, G. (1985), *With Due Care and Attention,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Informal Care Occasional Paper, No. 2*, London: Family Policy Centre.
- <sup>cq</sup> Power, M. (1976), 'Cast-off Jobs: Women, Migrants, Blacks May Apply', *Refractory Girl*.
- <sup>cr</sup> Sassoon, A. S. (ed.) (1987), *Women and the State*, London: Hutchinson.
- <sup>cs</sup> Torney, J. F. (1976), 'Exploitation, Oppression and Self-Sacrifice' in C. C. Gould and M. W. Wartofsky (eds.), *Women and Philosophy*, New York: Capricorn.
- <sup>ct</sup> Ungerson, C. (1985) 'Paid Work and Unpaid Caring: A Problem for Women or the State' in P. Close and R. Collins (eds.), *Family and Economy in Modern Society*, London: Macmillan.
- <sup>cu</sup> Vellekoop-Baldock, C. (1990), *Volunteers in Welfare*, Sydney: Allen & Unwin.
- <sup>cv</sup> Wheeler, L. (1986), *Close to Home: The Community Services Industry, New South Wales NCOSS Issues Paper 7*, December.
- <sup>cw</sup> Wells, G. (1987), 'Unionising Community Services', in *community Welfare Services: A Rural Focus Conference Proceedings*, Wagga Wagga, New South Wales: Reverina and Murray Neighbourhood Centres Group.
- <sup>cx</sup> Yates, I. and A. Graycar (1983), 'Non-government Welfare: Issues and Perspectives', in A. Graycar (ed.) *Retreat from the Welfare State*, Sydney: Allen & Unwin.